

苏修“经济改革”文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苏修“经济改革”文集

孙尚清 章良猷 编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苏修“经济改革”文集

孙尚清 章良猷 编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0·25 印张 484,000 字

1975 年 12 月第 1 版 197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4002·255 定价 1.85 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编辑出版这本文集，是为批判苏修叛徒集团复辟资本主义提供反面的参考材料。

本文集选辑了苏修头目柯西金在1965年苏修中央九月全会上的报告（这是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推行“经济改革”的“纲领”）以及1965年9月苏修正式宣布实行“经济改革”起至1974年6月苏修报刊上发表的有关“经济改革”的文章。这些文章主要选自《真理报》、《共产党人》、《经济问题》、《计划经济》等报刊，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从“理论”上为苏修“经济改革”进行辩护的；一类是对“经济改革”的各项措施进行解释和评述的。通过这些文章，对“经济改革”的修正主义实质，对苏修在经济领域里复辟资本主义的具体过程，可以有一个概括的了解。

苏修的“经济改革”包括所有国民经济部门，但工业中的“改革”是整个“经济改革”的重点，它集中地体现了“经济改革”的原则和基本内容。因此，本书只选录与工业有关的“经济改革”的文章。为了反映苏修“经济改革”整个进程的概貌，我们在有关方面提供资料的基础上编了《苏修“经济改革”纪事》，作为本书附录，内容仍以工业为主，同时也涉及国民经济其他一些重要部门。

本文集的文章按原文发表的时间排列，一部分文章是节译的。

为了便于阅读，我们在每篇文章前面加了简短的批注。

编者序言

——苏修“经济改革”的反动实质

苏修叛徒集团篡夺党政领导权后，接着就以政权为杠杆，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建立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过程，就是苏修推行“经济改革”的过程。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他在国内经济方面干的头一件大事，就是于1965年9月正式宣布实行“经济改革”。

“经济改革”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 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

“经济改革”本是赫鲁晓夫的未竟之业。当赫鲁晓夫窃取苏联政权后，为了彻底瓦解社会主义经济，复辟资本主义，他在1957年3月就提出要“扩大企业和经济机关领导人的权限”，把“赢利”作为企业“主要指标”。1961年10月，他又在苏修二十二大上鼓吹“提高利润和赢利率的作用”，并把它作为党的“纲领性要求”。1962年9月9日《真理报》刊登利别尔曼的《计划、利润、奖金》一文，抛出“扩大企业权限”，减少国家规定的指标，给予“经济活动的自由”，按赢利率高低来评价和奖励企业，“赢利率越高，奖金越多”等“建议”；《真理报》加的按语说：“提出了重要的原则性问题”，“具有重大意义”，接着就在全中国报刊上广泛组织“讨论”。自抛出利别尔曼建议起，到1963年2月，在四个多月的时间里，苏修《真理

报》、《共产党人》、《经济报》、《经济问题》、《计划经济》等报刊先后发表了包括经济机关领导人、企业领导人和经济学家的三十四篇署名文章,两篇编辑部文章,报道了苏国家计委、科学院分别召开专门会议进行讨论的情况,各报刊编辑部还召开座谈会,发表会上发言四十八篇。1963年3月至1964年3月,继续发表有关文章和报道二十三篇。^①通过“讨论”,全面攻击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大造“改革”舆论。在“讨论”中,赫鲁晓夫带头表示,利别尔曼建议是“宝贵”的,并于1962年冬决定在乌克兰和列宁格勒等地进行“试验”。1964年初又决定在莫斯科、顿涅茨、德涅伯、哈尔科夫等重要工业地区的八十个企业中“试行”“新奖励制度”。同年7月又在莫斯科和高尔基城的两个联合企业中全面“试行”利别尔曼建议。经过上述紧锣密鼓的舆论准备和典型试验之后,正在搞相应的立法并进行全面推广之际,赫鲁晓夫垮台了。

勃列日涅夫一上台就宣称“坚定地、始终不渝地贯彻执行”二十大、二十二大“路线”。他在1965年9月召开中央全会,通过《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决议,10月又公布《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用党的决议和政府法令的形式把赫鲁晓夫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固定下来。勃列日涅夫叛徒集团在接茬搞“经济改革”时,肯定赫鲁晓夫的“试验”是“宝贵的”,要“以已有的实际试验的成果作基础”继续干下去。在进一步广泛“试验”的同时,从1966年开始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全面推行。到1970年前后,又开始大搞合并企业、建立生产联合组织。这是“经济改革”中“企业发展的新阶段”。自1965年9月至1973年9月,苏修发布的有关“经济改革”的“决议”、“指示”、“条例”、“办法”,据不完全统计,就有一百七十多个。截止1972年底,有四万三千多

^① 这些材料,详见《苏联报刊关于利别尔曼建议的讨论文集》及其《续集》,三联书店1963、1965年版,内部发行。

个工业企业已经“改革”，占工业企业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七左右，按生产量则占百分之九十四，工业的“改革”已基本完成；交通运输业的“改革”已于1969年完成；邮电业已于1970年完成；生活服务业已完成百分之八十六。^① 苏修二十四大规定，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改革”，统统要在1975年以前完成。苏修“经济改革”经历了舆论准备、典型试验、全面推行和建立生产联合组织等阶段。

这样，由赫鲁晓夫开始的复辟资本主义的路线，在勃列日涅夫手中得到了继续和发展，步调也大为加快了。作为在经济领域复辟资本主义全套措施的“经济改革”，是赫鲁晓夫长期准备的，是勃列日涅夫全面实行的。

“经济改革”使苏联经济蜕变为 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苏修头目给“经济改革”下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定义：“经济改革不是一时的行动。这是一个为了取得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优越性而完善经济管理的过程。”^② 通过“经济改革”所建立的“新经济体制”，包括以“经济刺激”取代“行政干预”，加强企业的“独立自主性”，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制”，实行“生产集中化”和“按部门原则的集中化管理”等重要组成部分。

那么，苏修的“经济改革”究竟是什么货色？通过“改革”所建立的“新体制”又是什么东西呢？

苏修的“经济改革”，是包括整个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全面“改革”。在这里，着重把“经济改革”的最重要领域——工业部门的“改革”过程加以初步剖析。

① 以上数字见《经济报》1973年第1期。

② 《真理报》，1971年4月7日。

千改万改，主要是改如下的四个方面；从这些“改革”中，可以看清“新体制”的实质。

第一，把社会生产目的“改革”为追逐利润

苏修头目叫嚷：“引导企业提高生产效率的最好方法，就是利润和赢利率指标”^①，“新体制，首先要求加强利润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②；苏修报刊也大肆宣扬利润是“反映企业工作成果的唯一标准”，是“最全面、最客观、最准确、很容易懂并能总括企业经营一切方面的指标”，是“工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是“生产的目的”。与此同时，从1965年开始，在一些企业中实行“只给它们规定一个计划指标——上缴预算的利润提成额”。这样，利润就不仅在舆论上，而且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成为生产目的了。请看一个经理的自白：“我们面前只有一项任务，即尽可能多地出售产品，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

社会生产的目的，是生产关系的本质表现，是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生产资料掌握在不同的社会集团或不同的阶级手中，社会生产就得服从该集团或阶级的需要，并为他们的利益服务。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的特征时写道：“**生产剩余价值，赚钱发财，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③追逐利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动机和目的”，也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而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正如列宁所说“**共同劳动所创造的财富为全体劳动者而不为了一小撮富人造福**”^④。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利润，而是为满足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和全体劳动人民的

① 《真理报》，1965年9月28日。

② 同上，1971年4月7日。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680页。

④ 《列宁全集》第7卷，中文版，第185页。

需要。由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窃取领导权，标志着无产阶级专政蜕变成资产阶级专政，他们掌握和控制的一切生产资料也就丧失了原来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性质，而变成官僚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了。通过“经济改革”实行以利润为生产目的，正是所有制性质发生上述质变的同步现象，也是社会主义经济蜕变为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表现。

第二，把企业“改革”为资本主义经营单位

苏修在“扩大企业权限”的一片喧嚣声中，“为扩大了的企业权限确立巩固的法律保障”。部长会议于1965年10月4日批准了《社会主义国营生产企业条例》，其中规定：“企业行使占有、使用 and 支配归它经营管理的财产的权力”；“企业可以把多余不用的设备、运输工具、原材料”等“出售给其他企业和组织”，“所得款项归企业支配”；企业还“可以把暂时不用的设备和运输工具出租给其他企业和组织”。这样，企业领导人就不仅拥有生产资料的占有和使用权，而且拥有出售和出租生产资料的权利。这实际上就是完全的所有权。生产资料公有制被“改革”得只徒具其名了。一般说，企业领导人成了新型资本家，他们作为苏修统治者的代理人，获得了按资本主义原则从事经营活动的经济条件和法律保障。

《条例》还规定，企业领导人“有权规定并自行批准企业的结构和编制，规定工资水平和奖金”，有权“招收和解雇工人，对企业的工作人员采取奖励措施和进行处分”。这样，生产资料所有权连同经营管理、生产指挥和分配的权力都落到一小撮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手中。昔日是生产资料主人的苏联工人阶级，今日则处于无权地位。他们为了生活，只能按那班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规定的工资，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象在老沙皇时代一样，随时都可能遭受处分，以至被解雇。他们的工资已不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形

式，而是劳动力的价格了。他们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才能同生产资料相结合，而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也是社会主义企业蜕变成资本主义企业的基本标志。

近几年来，苏修又极力鼓吹建立生产联合组织，说这是“完善管理体制的新的的重要因素”。为此，苏修专门通过《关于进一步改进工业管理的某些措施》的决议，批准了《关于全联盟和共和国的工业联合组织的总条例》，规定了两级、三级管理体制和联合组织的职权、任务等。此后，联合组织在各大城市迅速推广，合并企业的速度更加快了，联合组织一类大型垄断企业不断增加。据苏《经济报》1972年报道，到1971年已建立八百七十九个联合组织，被合并的企业达三千六百五十五个。这些联合组织不过是以美国垄断组织为蓝图、在兼并小企业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垄断企业的复制品。这是苏修统治集团加强对经济的垄断统治，进一步发展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用来适应社会帝国主义政治，建立社会帝国主义经济基础的一个重要步骤。

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企业领导人依仗权势，大肆解雇“不守纪律”的工人。1970年，仅工业部门就有六百六十三万多职工被解雇，占工业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一。^①苏修第一副总检察长供认：“解雇职工的事”，“在许多州都存在”，“被解雇的人在库尔干州占百分之四十七，在伏尔加格勒州占百分之四十一·二，在新西伯利亚州占百分之四十一”^②。据苏修报刊披露，1967年因旷工、怠工造成的损失达二百五十亿卢布。于是勃列日涅夫亲自出马，先是在苏修二十三大上威胁说，要“加强劳动纪律”，“要无条件地执行”“法律和规则”，他亲自把“加强法纪”规定为“全国性的、全党的任务”^③；随后他又在二十四

① 见《经济问题》1972年第3期。

② 《真理报》，1969年1月3日。

③ 同上，1970年6月13日。

大上气急败坏地叫嚣要“尽一切努力”，“保证最严格地遵守纪律”，并且还要“对破坏纪律者严加处分”^①。但是，压迫和反抗总是成正比例地增长，伴随苏修统治集团的加重压迫，只能引起工人阶级的加剧反抗。

第三，把国家对企业的计划领导 “改革”为“经济刺激”

苏修叛徒集团把国家对企业的计划领导说成是什么“行政方法盛行而排挤了经济方法”，是“严重缺点”，“给企业规定大量计划指标，这种作法限制了企业职工自主性和主动性”，因而决定“必须减少上级组织为企业规定的计划指标的数目”（《关于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经济刺激的决议》）。接着就取消了原来由国家下达的一系列指标，如产量、成本、职工人数、奖金等，使利润指标居于统帅地位；企业“以消费者订货为依据”来制定自己的产品生产计划。同时准备推行只用“净产值”（等于利润加工资，但主要是利润）一个指标。为此，1969年至1971年曾在一百零六个企业中“试行”，并得出“原则上是可能的”结论，准备再“试行”一段时间即全面推广^②。这样，企业就可以为追逐利润而不顾一切了。

苏修的“新经济体制”包括要求企业实行“完全经济核算制”。这是一种在苏修国家控制下，企业独立经营，在经济上“以收抵支”，在经营结果上同国家“利润分成”的制度。实行这种制度，企业最关心的是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国家最关心的是“上缴利润”。企业的利润越大，提成的利润额越大，由提成利润的相当部分形成的“物质刺激鼓励基金”也越大。而奖金的分配权又操在经理之手，因而大部分奖金被少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高薪的工程技

① 《真理报》，1972年3月21日。

② 见《经济报》1973年第7期。

术人员所套取。在七百零四个工业企业中，每月奖金平均数为：工程技术人员三十点五卢布，占他们工资的百分之四点三；工人仅为一点三卢布，占工资的百分之一点五。^①列宁格勒一位工人投书报刊揭露：“我们厂百分之八十的利润属于当官的，我们敢怒不敢言。”这就进一步加深了阶级矛盾，并大大加剧了阶级分化的过程。

苏修宣称原来那种国家通过预算拨款对企业直接投资、由企业按国家计划无偿使用的制度，“不符合经济刺激原则”，而改行“基金付费”制度。所谓“基金付费”，就是企业用国家基金要花钱付费。根据企业拥有的固定生产基金和流动资金，按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六的比率向国家付费（《企业、联合组织和工业部门改行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新体制办法说明》），误期付费者，课以“罚金”。这实际上就是，国家付出资本，坐收资本利息。这样，国家同企业的关系就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从经济关系的本质上看，在“利润分成”下，作为垄断产业资本家的国家与作为个别产业资本经营单位的企业之间，瓜分作为剩余价值转化形态的利润；在“基金付费”下，作为垄断金融资本家的国家，向企业贷款，作为经营资本家的企业经理，把榨取工人剩余劳动的一部分，作为资本利息交付国家。苏修统治集团就是工业垄断组织与银行垄断组织混合而成的金融寡头，是最大的官僚垄断资本家。所以难怪苏修还把政府的“仪表制造、自动化工具和控制系统工业部”也干脆改行“完全经济核算制”。该部部长宣称：“仪表制造部从1970年7月起就完全放弃了国家预算资金，改为以收抵支，部门和整个部的开支，包括发展科学、社会文化设施、基本建设投资以及部局管理费用，都是靠根据批准的长期定额留给部支配的那部分利润来解决。”^②试看，苏修政府的部不是已经变成资本主义托拉斯了吗？

① 见《经济问题》1968年第6期。

② 《计划经济》，1973年第1期。

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对全民所有制企业实行计划领导，是社会主义公有经济沿着为人民服务的路线顺利发展的根本保证。而这种计划领导，主要是通过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国家对企业下达反映政治经济总任务的一系列法令性指标，统一的经济政策，生产资料 and 产品的计划调拨制度，以及财政保证和监督等手段实现的。列宁说：“如果对于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不实行全面的国家计算和监督，那末劳动者的政权，劳动者的自由，就不能维持下去，资本主义压迫制度的复辟，就不可避免。”^① 苏修官僚资产阶级专政国家，根本不可能实行任何社会主义计划化，而只能实行官僚垄断资本的所谓“计划”。他们的所谓“五年计划”之类，纯属为一小撮苏修统治者的利益服务的，是加紧剥削劳动者的计划。

苏修本想用“经济刺激”办法能“最大限度地刺激工业企业的创造性”；凡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产品质量，采用新技术，使企业接受“紧张计划”，挖掘潜力等等，莫不乞灵于“经济刺激”。但事与愿违，企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追求“经济刺激”，反而千方百计地对上隐瞒潜力，阻碍新技术的采用和推广，抵制“紧张计划”，以便为搞利润大的产品生产留下地盘，劳动生产率更是难以提高。他们巧立名目，抬高物价，偷工减料，降低质量，牟取暴利。尔虞我诈，唯利是图的丑恶事例，比比皆是。这是苏修的“经济方法”和“经济刺激”的必然结果，也是资本主义复辟所带来的社会现象。

第四，用“物质刺激”“改革”人的灵魂

苏修把“物质刺激”吹成是“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动力”，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所面临的许多问题的钥匙”。赫鲁晓夫把“物质刺

^① 《列宁选集》第3卷，中文第2版，第506—507页。

激”规定为他们“在整个共产主义建设时期的方针，我们的路线”。在他垮台前不久还叫喊“应该大胆地沿着对产品数量和质量实行物质鼓励的道路前进”。勃列日涅夫承认“物质刺激”也是他们的“路线”^①，并鼓吹“每一个工作者应该感到工资与自己的集体生产成绩有直接联系”^②。苏修劳动工资问题委员会的一个头头对“物质刺激”作了一个绝妙的解说：“先好好干，然后根据整个集体挣得的利润数额来分得自己的一份。”顺便指出，苏修近年来强调的所谓“精神刺激”并不是什么新鲜玩艺儿，也不过是赫鲁晓夫的老调重弹。苏修对“精神刺激”的解释是：“奖予勋章、奖章，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崇高称号和奖金。”而他们的“勋章”、“奖章”和“称号”，又都是同“奖金”、“免费疗养证”、“免费旅行”之类的“物质刺激”联系在一起的。他们声称，“精神刺激和革命热情必须用物质刺激来巩固”^③。因为苏修不可能有什么鼓舞人民革命战斗的政治精神力量。在现代修正主义者看来，人干任何事情都是为了钱，“钱能通神”，用钱可以“刺激”出一切。因此他们认定“物质刺激”是“动力”，是“钥匙”，是“路线”。这充分地反映出赫鲁晓夫一勃列日涅夫一伙叛徒的铜臭熏天的资产阶级世界观。他们就是用这种世界观来“改革”即腐蚀人们的灵魂。

十月革命以后，劳动者第一次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这就激发出空前未有的劳动积极性。列宁当时说：“他们千百年来都是为别人劳动，为剥削者做苦工，现在第一次有可能为自己工作了。”^④那时，在极端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出现了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伟大创举。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忘我

① 《真理报》，1971年3月31日。

② 同上，1972年3月21日。

③ 参阅《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苏联“经济”出版社1971年版。

④ 《列宁选集》第3卷，中文第2版，第393页。

劳动热情和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难道是用物质刺激出来的吗？苏修推行“物质刺激”，就是把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热情“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①，使人们变成干活为了钱，钱多多干，钱少少干，斤斤计较个人利益的“夏洛克式”的人物，即列宁坚决反对的那种“我赚我的钱，其他一切都与我无关”的人。苏修妄图把劳动者“改革”成由卢布驱使，忘掉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不问政治的芸芸众生，盲目跟着他们跑，驯服地接受他们的摆布。在“物质刺激”下，虽有人被他们搞得把追求金钱作为人生目的和行动准则，但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觉醒起来。苏修的“物质刺激”谬论，是对苏联劳动人民的极大侮辱。

苏修叛徒集团在“物质刺激”掩盖下，不断加强对工人的剥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苏修公开宣传“物质刺激的支出可以得到百倍的回收”，因而是“一本万利的事情”。他们为了“刺激”工人为其出力，在“经济改革”中制定了五花八门的工资、奖金制度，其中最突出的是，推行谢基诺化学联合企业的“经验”。办法是，工人身兼数职，增加管理机器的台数，然后把“多余”人员裁减解雇，再把由于裁员而“节约”的工资基金，用来“奖励”那些兼职和完成扩大工作量的工人，但奖金数额不得超过工资的百分之三十。这完全是资本主义的血汗制度。如果一个工人由于兼职而干两个人的活，但他得到的“奖金”却最多只能比原工资多百分之三十，从而更大量的剩余劳动被榨取，剩余价值率直线上升，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奖金”大量增加。加重对在业工人剥削的同时，大量工人被解雇。1971年，实行谢基诺办法的一百二十一个企业，就有六万五千多人被裁减。谢基诺办法还破坏工人之间的团结。所以勃列日涅夫对这种毒辣的、有一石双鸟之效的办法，表现出异乎寻常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中文版，第253页。

的兴趣。1969年10月9日，苏修中央专门发布推广这个“经验”的决议。1971年3月30日，他又亲自在二十四大上极力兜售，要“更广泛”地“刺激”“兼职”的工人为他们卖命。

为了“物质刺激”，苏修规定的最高最低工资相差五十倍以上。如果加上高薪阶层的高奖金、兼职薪金、补助、津贴以及高稿酬等等，差别就更悬殊了。一小撮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依据权力无止境地吮吸劳动人民的血汗，过着豪华奢侈、挥霍无度、荒淫无耻的生活。他们根本不是执行列宁的遗训，当人民的勤务员，而是骑在人民的头上，作人民的老爷。

苏修推行“经济改革”的过程表明，其所“改革”掉的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而通过“改革”建立的“新体制”，则是不折不扣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

“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苏修上台之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之时。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性质，都决定于政权的性质。政权性质的改变，意味着所有制性质的改变。但人们的相互关系和分配关系，以及经济管理方法、体制的变化，却不可能跟政权性质的改变从而所有制性质的改变同时完成，而需要一个“改革”的过程。苏联政权的质变，引起同原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同苏修推行的对内剥削压迫人民，对外侵略扩张、建立霸权的社会帝国主义政策是水火不相容的。因此，苏修叛徒集团利用窃取的国家机器，迫不及待地对原有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进行“改革”，以建立其社会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现代修正主义是先篡夺政权，然后改变生产关系，从政治到经济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的。

“经济改革”使苏修经济陷入困境

苏修叛徒集团全面推行的“经济改革”，把苏联经济引入资本主义邪路，带来资本主义固有的一系列无法克服的矛盾，国民经济陷于困境，生产管理一团糟，各生产部门比例失调，经济增长速度减低，农业落后状况也并未改观。

国民经济军事化是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苏修为对外扩张和争夺势力范围，为同美帝争霸，为侵略掠夺中小国家，不断疯狂扩军备战和加速国民经济军事化。勃列日涅夫声称：“在军事方面比任何其他方面都更加不能止步不前”，“国防问题处于我们一切工作的首位”^①，“大量的资金要用于国防”^②。苏修上台以来，军费急剧膨胀。他们为了欺骗人民，一贯把军费开支的很大部分隐藏在国民经济拨款和科研拨款项目之中。赫鲁晓夫1959年在美国电视讲话中承认，苏每年军费“将近二百五十亿美元”，约为其公布军费的二倍半；有的苏经济学家透露，苏军费开支比官方公布的数字要高三倍或四倍；据估算，苏修1972年的军费开支约为五百四十五亿卢布，占当年预算总支出的三分之一，占国民收入的六分之一。据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的材料，1973年军费又猛增至七百多亿卢布；1974年的军事预算，实际上将达到八百一十亿美元到九百亿美元之间，比公布军费数字（1974年为一百七十六亿卢布，约合二百亿美元）高四、五倍。甚至苏修头目也供认“军队和军备开支已成为苏联国民经济的沉重负担”。

苏修增加军费主要靠减少工农业投资。他们打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旗号，把机器制造业和其他部门的大量企业用于为军工

① 《真理报》，1967年7月6日。

② 同上，1969年6月8日。